

民众“国际观”的理论类型与实证分析 ——2011 年与 2015 年两波全国性抽样调查的分析

王 鑫^{1,2}, 肖唐镖¹

(南京大学 1. 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2.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国际观反映的是民众对于境外世界接纳与否的态度和取向。本文从文化、政制、领土、经济 and 种族等五个维度,对境外世界或接纳或排斥、或征服或屈从的态度和取向,将国际观归为利己主义型、利他主义型和中间型 3 大类,及沙文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统天下观、自由主义、地区主义、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等 8 个小类。依据两波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民众的国际观总体上较为保守,多数人希望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主张限制进口外来商品和限制、减少外来移民。来自国家优越感与国族认同感的影响,显示了民族主义对国际观的反向作用;威权人格取向的民众更加排斥生活和经济上的开放;国外关注度和教育程度对开放生活方式和境外产品有正向影响,而传统主义价值观则有反向影响。此外,年龄、政府绩效与生活满意度评价也对民众国际观的不同面向有着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观; 理论类型; 民族主义; 威权主义; 传统主义; 国外关注度

中图分类号: D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8)04-0024-10

The Theoretical Type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mon People's "International View"

——An Analysis of Two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s Conducted in 2011 and 2015

WANG Xin^{1,2}, XIAO Tangbiao¹

(1. Public Affairs and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2.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ommon people's international view reflects the attitude and orientation of their acceptance of the outsid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dimensions: culture, politics, territory, economy and race, accepting or excluding, conquering or subjugating,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the international views roughly into three types: egocentric, altruistic and intermediate, and then reclassifies them into eight sub-types: chauvinism, populism, nationalism, traditional view of heaven and earth, liberalism, regionalism, cosmopolitan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national survey data, the international view of our people is generally conservative. Most people want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way of life, and advocate restricting the import of foreign goods and reducing foreign immigrants. National superior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factors show that nationalism have re-

收稿日期: 2017-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编号: 16AZZ003); 南京大学引进人才项目“中国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研究”

作者简介: 王 鑫(1988-), 男, 安徽淮南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公民价值观、基层政府治理。

肖唐镖(1964-), 男, 江西泰和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基层治理、中国政治。

vers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view. People who have the orientation of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re more exclusive of the openness in life and economy; foreign attention and educational leve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pen lifestyle and acceptance of foreign products, while the traditional value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In addition, ag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people's international view.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view; theoretical types; nationalism; authoritarianism; traditionalism; foreign attention

2015年夏,一场肇始于中东、非洲等地的难民危机席卷了欧洲大陆。一时间,面对滚滚涌动的难民潮,希腊和意大利束手无策、放任自流,德国和法国呼吁慷慨接纳,东欧国家则关闭国境,拒绝难民的安置。^[1]而关于难民危机,欧洲社会掀起了广泛的讨论,有学者甚至认为它会影响到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导致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头。^[2]不仅在欧洲,早前随着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社会也出现了相关的讨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主义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美国还是美国人的美国?^{[3] (P302-305)}事实上,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观点,不仅反映出各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理性选择,更反映出各国在作为价值观层面的国际观上的不同。

国际观问题之于中国较为特殊。有别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传统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封闭的文化独立体,是一个具有强烈“天下”意识而非民族国家意识的社会。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中国即天下,而外邦的他者皆为“胡虏”或“蛮夷”。依据费正清先生的观点,传统中国是一个奉行“中国中心主义”的国家,“天下”是由“中国化”地带、“内陆地带”和“外国地带”建立起来的一套等级森严的朝贡体系,居于中心地位的是和中国文化相近的周边国家,其次是内陆国家,而这些国家在中国看来都作为附属国家而存在。^{[4] (P2-9)}自鸦片战争以降,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世界之于中国再非过去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在国人眼中展现开来,传统的国际观受到极大的冲击。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战略,价值观层面深受共产主义国际观的影响。秉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理想的新政权视自己为国际主义者,而一个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5] (P43)}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环境和国内政治发生变化,奉行“既反帝、又反修、大力支援第三世界地区人民”的新外交路线,同时深陷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内外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构着中国民众的国际观。自改革开放、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和国外同时发生着巨变,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使中国作为世界整体的一部分日益被国人接受,信息时代的来临更使国人在享受现代化福利的同时,有了前所未有的渠道表达对外态度的意见。显然,民众对外态度的这种变化,正如海外学者的研究显示,已在悄悄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6] (P1)}

上述简要的历史梳理表明,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理应受到传统中国的“天下观”、革命中国的“国际主义”和新近中华的“民族主义”等多重元素的影响。然而,当下国人的国际观究竟呈现怎样的总体性特点,其影响因素又有哪些,迄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给予清晰的论说。为此,本文将通过2011年和2015年两波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予以初步探析。首先,我们将在梳理学界有关“国际观”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建构其系统化的理论类型,分析相应的测量标准;其次,结合相关的学术文献,提出本文拟验证的5个理论假设;再次,以实证数据,描述性分析我国民众国际观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验证诸研究假设;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国际观的概念建构与测量

(一) 概念建构与理论类型

国际观究竟为何?目前学界对此的讨论并不多见。最早的研究可见诸琼·赫维茨和马克·佩夫利的讨论,他们倾向于用国际态度来分析公众对国际事务的看法。据他们的说法,国际态度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对本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2)对其他国家的印象;(3)有关政策态度。其中,第一项态度对

应的是民族主义,反映的是公众对本民族国家的态度;第二项态度反映的是对外国国家形象的态度;第三项态度对应的是有关外交政策的态度。^{[6] (P25)} 韩冬临沿用了赫维茨和佩夫利的部分框架,认为在讨论国际观时应重点讨论公众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以及对诸如国际信任、国际秩序观、新国际主义、国际贸易态度等外交与外交政策有关的态度。^{[6] (P25-30)} 中国社科院曾组织“中国民众的国际观”调查,将国际观细分为民众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日本、美国、俄罗斯、欧洲、拉美)的政治态度,^{[7] (P2)} 仍是沿用了赫维茨和佩夫利的分析框架中的第二项态度。

此外,有学者认为国际观是指一国政府和人民对现存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看法,通常受该国历史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8] 当然,也有学者更为简单地将国际观等同于全球视野或国际主义。

上述研究对建构“国际观”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却均未涉及作为价值观层面的国际观之内涵。根据价值观的定义,价值观应在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起着原则性的指导作用。从价值观的层次上看它具有超越情境的特点,而态度具有情境性,所以,价值观要比态度更抽象更概括;但与价值观相比,态度和行为的距离更近。^[9] 故此,在笔者看来,现有研究中国际观的界定往往聚焦于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或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态度,因此在概念上设定了特殊的情景,具有操作化的优势与分析的针对性。不过,本文的国际观建构更强调一般化的态度和价值,即民众对本国与整体世界间关系的一般性看法、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与接纳程度。

我们以为,国际观反映的是民众对于外部世界接纳与否的态度和观点,具体而言,即对外部世界在文化、政制、领土、经济和种族等五个维度上,或接纳或排斥、或征服或屈从的态度和观点,不同的国际观类型即为五个维度上不同观点的组合。依据对外部世界的总体观点与看法,我们可将不同类型的国际观归为利己主义型、利他主义型和中间型3大类,并细分为沙文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传统天下观、自由主义、地区主义、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等8个小类(详见表1)。下面略叙之。

表1 国际观的理论类别与类型

国际观大类	国际观的小类	文化关系	政治关系	领土要求	经济关系	种族关系
利己主义型	沙文主义	以本国、本民族文化为中心	以本国为中心,干涉别国内政	以本民族利益为重,对他国有领土要求	对他国进行经济干预和掠夺	以本民族、国族为中心,排斥其他种族和民族
	民粹主义	反精英化、反现代化、	以本国为中心,大众民主主义	以本民族利益为中心	维护本国经济,排斥外来经济	以本民族为中心,排斥其他种族和民族
	民族主义	以本民族文化为中心	以本国利益为中心	以本民族利益为中心	维护本国经济,排斥外来经济	以本民族、国族为中心,排斥其他种族和民族
	传统天下观	儒家文化圈	朝贡体系	天朝与藩属	朝贡体系	无
中间型	自由主义	尊重不同文化	各国平等	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平等合作和自由竞争	一切种族、民族平等
	地区主义	区域内文化一致性高	各国平等	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区域内平等合作和竞争,区域外实行地区一体化	强调本区域内的民族利益
利他主义型	世界主义	强调个体和普世价值	尊重个体意愿,强调公平和正义	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平等合作和自由竞争	一切种族、民族平等
	国际主义	要求建立统一文化和信仰	对他国进行输出革命	无	对他国无条件援助	一切种族、民族平等

首先是利己主义型国际观。这类国际观在文化上强调以本民族、本国族的文化为中心,在政治上强调本国利益,在经济上排斥外来经济,在种族和民族上坚持以本民族为中心。这类国际观包含了沙文主义国际观、民族主义国际观、民粹主义国际观和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沙文主义是最强调本民族利益的国际观类型,持此类国际观的人在文化上强调本民族的文化高于其他文化,在政治和经济上强调对他国进行利益上的扩张和侵略、干涉别国内政并对他国有领土要求,一切唯本国是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国际观在领土、经济和种族上的观点类似,不同的是,民粹主义者更加反对全球化和精英化,而民族主

义者则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感并排斥其他民族。不同于前述三种国际观,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是一种封闭环境下生成的国际观,它是以儒家文化为依托而形成的一套传统的朝贡和藩属体系,在政制上强调自身是“天朝上国”,周边国家是藩属,在经济上是藩属国对“天朝”的朝贡和“天朝”对藩属国的恩赐。

其次是中间型国际观,它包含了地区主义国际观和自由主义国际观。地区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中叶,这时随着大量地区类跨国组织的出现,地区主义国际观也被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确立了下来,它更强调本地区的利益,主张区域内的各国在文化上有较高的同质性,在政治和经济上强调区域内国与国平等合作,而在区域间则强调相互竞争。而自由主义国际观强调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各国、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和自由竞争。

再次是利他主义型国际观。这类国际观不以本民族、本国的利益为中心,高度重视作为个体或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价值,强调个体价值的优先性和人类价值的普世性。^[10]在世界主义国际观者眼中,所有的个体应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民族也应是绝对平等的;在平等的基础上,所有个体、民族和国家应建立和遵循一套普世的价值,即公平和正义。作为利他主义型的另一种国际观,共产主义国际观则基于一体化“共产主义”的理想,重视革命输出,因此在政治上对他国的干涉也较多。

显然,以上对国际观理想类别的建构,是在理论意义上对观念类别的左中右形态进行的理论切区,将不同的国际观类型对应在其相应的刻度上。如要对我国民众的国际观进行系统的测量和分析,则需进行更为具体而可靠的操作化。

(二) 国际观的测量

国际社会向来注重民意调查,近几十年来一直有各种民调公司开展大型的跨国调查。这其中影响和规模较大的调查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百人会、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美国盖洛普公司、美国马里兰大学、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民意调查。^①而在国内,中国社科院先后组织了多波调查探讨中国民众对中欧(2005、2007)、中日(2002、2004)、中美(2005-2007)、中俄(2007)的态度。^{[7][13]}除了这些专门针对公众对外态度的调查,一些综合性调查也涉及公众在国际观上的态度,如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史天健与朱云汉教授团队主持的亚洲民主态度调查(Asia Barometer Survey)、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不同的调查因主旨不同,其有关国际观调查的侧重点也不同。

首先是针对民众对他国态度的调查。设计者往往将对他国的态度操作化为对他国的情感评价和对两国关系的功能性评价。如在中国社科院的调查中,调查者就采用了如下问项“请问您对某国的亲近感如何”“您觉得某国是中国的敌人还是朋友”。^{[7][178-200]}这两个问项中的前者侧重于情感层面,后者侧重于功能层面。此外,也有研究针对情感评价,专门设计了名为“情感温度计”的测量,具体为“我想知道您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看法。评分从0分到100分,0分最低,100分最高,如果我们给出的国家您不认识,您不必对他进行评价,我们会跳过他,继续下一个国家”。^[11]

其次是民众对国际主义的态度调查。研究者往往将国际主义操作化为民众对本国是否应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看法。如芝加哥全球观调查的问项为“您认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还是置身事外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最好?”全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维度与此相似,只是细化成三个维度“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1)中国应该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2)虽然非洲离我们很远,我们还是应该多派医疗队去帮助那里的黑人朋友;(3)中国应该派兵去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皮尤全球态度工程2002年对中国的一项调查则设计测量了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态度,“经济国际主义”被量化为六个方面:(1)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商业联系;(2)中国和外国之间更频繁的民间跨国交流;(3)从外国进口商品对中国是好还是坏;(4)从外国进口电影、音乐等对中国是好还是坏;(5)世界通过更多的贸易往来紧密联系,这对中国是好还是坏;(6)中国和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商业联系对个人是好还是坏。^[12]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或研究者也会调查民众对国际秩序或国际组织的态度,在此

^① 刘康. 利益、价值观和地缘政治: 中国崛起的全球民意调查. 载《领导者》2014年第2期,第104页。许多国内学者在对国际社会的中国态度进行研究时,多选取一些国际知名机构如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分析。

就不再一一介绍。

总之,上述调查或是针对某一时期一国民众对其他国家的看法,或是了解民众对特定概念如国际主义、经济国际主义的认知与评价。应当说,这些调查对一段时期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不可或缺。但这些测量侧重于表面化的态度层面,且往往嵌于一定的情景之中,难以揭示深层性的价值取向。换言之,在迄今为止有关我国民众国际观的研究中,尚未见较为系统而全面的实证成果。

本文后续的研究,也并非基于上述理论建构的系统设计而展开,而仅是根据现有的调查数据库,对我国民众的国际观做粗略分析。我们选用的是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库,其具体的测量问项分别为:“(1)您同不同意以下说法: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免逐渐变成其他国家的翻版?(2)您同不同意以下说法:为保护农民和工人,政府应该限制进口外国产品?(3)您认为政府应该增加还是减少我国的外国移民数量?”我们将以这三项指标分别测量民众对于生活方式的开放、经济开放的接纳度与外来移民的接纳度,进而讨论我国民众国际观的基本特点,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先后于2002年、2008年、2011年和2015年在我国进行了四波调查。因调查原初设计的局限,本文仅选取2011年和2015年两波数据,具体情况详见表2。

表2 ABS2011、2015年调查数据库的基本情况

数据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有效样本量
ABS 第三波全国数据	2011年7月至8月	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	3473
ABS 第四波全国数据	2015年7月至8月	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	4068

对于国际观的影响因素,学界已有大量讨论但观点不一,文化因素、结构因素及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均被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纳入讨论。它们也成为本文拟于验证的理论假设。

首先是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解释。有研究表明,海外学习、工作或交流的经历和跨国文化的经验均会影响民众的对外态度。如黄海峰通过调查实验数据发现,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生对外国会有更高的评价;倘若中国公民对外国社会经济状况有更积极的看法或过高的估计,其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评价往往更为负面。也就是说,对外国情况的乐观估计与对国内较低的评价之间至少存在部分的因果关系。^[13]Watson与Lippitt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跨文化经验易于导致政治价值观的可预见性转变。^[14]Han与David Zweig的研究表明,海外学习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对国际体系的观点。相对于其他任何国家,海归人士更看好自己留学的国家;他们亦可以成为意见领袖,影响国内对其留学国家的印象与态度。通过对过去十五年间加拿大与日本海归的调查,比较二者的“合作的国际主义”与“激进的民族主义”,他们发现海归比中产阶级表现出更多的“合作的国际主义”,也更是一个全球化主义者,民族主义相对更弱。^[15]也有研究发现威权国家的民众易受新闻媒体的影响,对媒体的接触度越高则民众的国际观则持更开放的态度。^[16]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对国外关注度高的中国民众在国际观上开放。对国外关注度这一变量,本研究采访受访者的题目为“请问您对国外发生的大事是否关注”。

其次是文化因素的解释。列文森认为,个体的文化优越感是对国际主义进行解释的最明显和最重要的自变量“国际关系中的种族优越感和其他形式的种族优越感一样,都是基于对内集团和对外集团做刚性的和普遍深入的区割”,^[12]依据他的观点,如果个体有着较强的文化优越感,则其对国际主义就有着深刻的排斥。卢春龙和田野则驳斥了该观点,有别于西方,他们发现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城市居民中,文化优越感和国际主义两者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12]但城市居民对于全体中国民众的代表性有限,在方法上也不能通过城市样本来推断全国。因此,本文更倾向列文森的观点,即国家优越感和国际主义之间是相斥的,并据此提出假设2:国家优越感越强的中国民众在国际观上更保守。对“国家优越感”的测量,本研究的题目为“假如其他国家的人变得更像中国人,世界将更美好”和“您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吗”。

政治文化研究通常聚焦于价值观念对于行为选择和政治信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在奉行儒教文化和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东亚地区,民众对于政府和政治领袖等政治权威象征有着较强的崇拜和依赖,这

种崇拜和依赖会形塑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17]同样,对于政治象征、政治权威的迷恋和民族主义也是相伴相生,故本文提出假设3:政治权威观强的民众在国际观上更保守。对于政治权威观的测量,本研究选取 ABS 调查中的政治权威观题组,对其进行了整合和加总。

由于民族主义的保守属性,以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表征的儒教文化也会在国际观层面展现出排外的属性。据此,本文再提出2个假设,即假设4:传统主义价值观强的民众在国际观上更保守;假设5:集体主义价值观强的民众在国际观上更保守。对传统主义价值观的测量,本研究选取了 ABS 调查中的“遵循父母”“宿命论”“婆媳关系”“重男轻女”和“遵循师长”几个问项进行加总处理。

此外,现代化因素作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模型,也被认为是影响国际观的重要因素。如 Johnston 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对民众的对外态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主要讨论了北京的中产阶级对于自由贸易、国际机构、军事开支、美国和民族主义的态度,其研究发现,一般中产阶级相比较低收入群体,表现出更大程度上的“新生的自由主义”。具体而言,支持自由贸易,相信裁军条约有用,反对增加军事开支,对美国友好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往往是富有、受过良好教育和了解国际事务的人。但相对于美国公众对外交关系的态度而言,中国中产阶级在某些问题上的态度仍不太“自由”,例如取消高额关税。^[18]同样,在经典的政治文化理论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教育是影响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因素,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支持国际主义政策,反之,教育程度越低,则可能支持孤立主义政策。^[19]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发现,年龄因素是影响政治价值观的重要解释变量,年轻世代更具开放的态度。^[20]为此,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和生活满意度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解释模型。

三、数据分析

(一) 中国民众国际观的分布现状

首先,对生活开放的接纳度。如表3所示,在2011年的数据中有83.6%的受访者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免变成其他国家的翻版”,有16.4%的受访者选择反对此观点。时至2015年,有83.3%的受访者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而反对的比例为16.8%。在两波数据中,受访者均表现出了高比例的保守倾向,认同我们应继续坚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对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拒斥的态度。且自2011年至2015年,此问题的回答比例仅有小数点后的区别,这也表明了我国民众在对外生活的接纳度上在近几年间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呈现出一致性的保守取向。

表3 生活开放接纳度

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免逐渐变成其他国家的翻版				
	2011年(N/%)		2015年(N/%)	
非常同意	419	14.0%	448	13.8%
同意	2086	69.6%	2259	69.5%
不同意	466	15.5%	496	15.3%
非常不同意	28	0.9%	49	1.5%
有效样本数	2999		3252	

其次是对经济开放的接纳度。如表4所示,在2011年选择开放和选择保守的民众近乎各占一半,有50.6%的受访者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为保护农民和工人,政府应该限制进口”,有49.4%的受访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此观点。此比例在2015年的调查数据中发生了变化,选择“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上升到了55.5%,比反对开放的比例多了11个百分点。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民众对经济开放持强烈的支持态度,^①但本文的分析并不支持此观点,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民众对经济开放持较为保守的态度,且这一比例在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① 如卢春龙和田野在他们的研究中就发现,中国的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表现出了强烈的支持态度,且这种强烈的支持态度和西方经验世界的研究(如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有较高的一致性。参见卢春龙、田野《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强度与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62-70页)。

表4 经济开放接纳度

为保护农民和工人,政府应该限制进口外国产品				
	2011年(N/%)		2015年(N/%)	
非常同意	179	6.1%	336	10.5%
同意	1298	44.5%	1438	45.0%
不同意	1367	46.9%	1309	40.9%
非常不同意	72	2.5%	116	3.6%
有效样本数	2916		3199	

再次是对外国移民的接纳度一项。因2011年的数据中缺少此问项,故本文只对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针对“政府应该增加还是减少我国的外国移民数量”一项,在2015年的数据中,有19%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外国移民数量”,有31.9%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保持现状”,选择“政府应该减少外国移民数量”的比例达到了42.3%,而剩下的6.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不再接受任何外国移民”。这表明,绝大多数的民众在对外来移民的接纳度上也呈现出了保守的倾向,绝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移民数量或至少应该维持现有的状况。

表5 外来移民接纳度

您认为政府应该增加还是减少来我国的外国移民数量?(2015年,N/%)		
政府应该增加外国移民数量	520	19.0%
政府应该保持现状	871	31.9%
政府应该减少外国移民数量	1155	42.3%
政府应该不再接受任何外国移民	185	6.8%
有效样本数	2731	

对上述3个项目测量的比较可见,以2015年数据为例,从接纳开放的角度而言,同意者的比例最高的为经济开放(55.5%),次为“外来移民”(19%),再次为“生活开放”(16.8%)。2011年的情况也大体相近。由此可见,在总体上民众的国际观较为封闭和保守。

为进一步探寻民众在国际观三个维度间的内部态度,我们依据2015年的数据对三个问项的回答归并为“保守”或“开放”,再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如表6。对三个问项的回答,685名受访者都持“保守”态度,占有有效访问量的28.03%;仅有6.22%的受访者持一致性的“开放”态度。此外,高达65.76%的受访者对三个问项的回答存在相互冲突,其中36.62%的受访者在两个问项的态度上表现出保守倾向,29.14%的受访者在两个问项上表现出开放倾向。这表明,无论是对在生活开放、经济开放还是在对移民的接纳度上,持有一致性开放态度的民众占少数,相反,多数民众表现出较强的保守倾向,这尤其表现为对生活开放与移民接纳的保守态度。

表6 中国民众国际观态度的内部分布(2015)

	生活开放接纳度	经济开放接纳度	移民接纳度	N	%
一致性保守	保守	保守	保守	685	28.03
	保守	开放	开放	531	21.73
	保守	保守	开放	503	20.58
相互冲突性	保守	开放	保守	312	12.77
	开放	开放	保守	109	4.46
	开放	保守	保守	80	3.27
	开放	保守	开放	72	2.95
一致性开放	开放	开放	开放	152	6.22
合计				2444	100

(二) 中国民众国际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解释影响中国民众国际观的因素、验证前述研究假设,本文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2011年和

2015年数据分别构建了如表7所示的ologit回归模型。

表7 中国民众国际观的ologit回归分析

	2011年		2015年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生活开放度	经济开放度	生活开放度	经济开放度	对待移民态度
新闻阅读	-0.214** (0.031)	-0.026 (0.029)	-0.052 (0.024)	-0.104* (0.021)	-0.082+ (0.022)
国外关注度	0.063 (0.041)	0.077 (0.039)	-0.217** (0.034)	0.189*** (0.031)	0.044 (0.032)
国族自豪	-0.706*** (0.063)	-0.161* (0.058)	-0.214** (0.063)	-0.159** (0.056)	-0.117** (0.057)
国家优越感	/	/	-0.743*** (0.070)	-0.231*** (0.064)	-0.107* (0.063)
传统主义	-0.075 (0.025)	-0.577*** (0.024)	0.127+ (0.020)	-0.230*** (0.018)	-0.029 (0.018)
集体主义	-0.123 (0.089)	0.025 (0.083)	-0.541*** (0.073)	-0.066 (0.066)	-0.011 (0.064)
政治权威观	-0.385*** (0.009)	-0.638*** (0.008)	-0.454*** (0.007)	-0.654*** (0.007)	-0.051 (0.006)
绩效评价	/	/	-0.048 (0.004)	0.159** (0.003)	0.134** (0.003)
党员	-0.059 (0.122)	0.120+ (0.115)	-0.158* (0.123)	0.011 (0.110)	-0.043 (0.109)
性别	-0.002 (0.086)	0.169** (0.081)	0.026 (0.075)	0.147** (0.068)	0.048 (0.070)
教育水平	0.088 (0.024)	0.165* (0.023)	0.055 (0.047)	0.171** (0.043)	0.135** (0.043)
生活满意度	-0.231** (0.021)	0.125* (0.020)	0.115+ (0.020)	0.113* (0.018)	0.016 (0.018)
年龄	-0.168+ (0.003)	-0.373*** (0.003)	-0.162* (0.003)	-0.227*** (0.003)	-0.209*** (0.003)
N	2744	2671	3227	3174	2714
Pseudo R ²	0.040	0.080	0.070	0.072	0.014

Standardized beta coefficients;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说明: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中因变量 数值越大表示越支持开放。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可得出如下判断:

1. 国家优越感和民众的国际观表现出了高度的负相关关系。西方学界对于此问题虽素有讨论但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21] 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国家自豪感与国际观之间正相关的解释。在回归分析模型中,两个自变量国族自豪感和国家优越感在2011年和2015年的两波数据中均与因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检验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其中或有两种深层逻辑的作用:其一,国家自豪感反映了民众对于本国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对本国的认同感强,觉得本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好,因而会排斥外来的干扰;其二,国家自豪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所具有的互斥性,就导致了国际观和国家优越感间的相斥。

2. 国外关注度和国际观之间的相关性较为复杂。本文的原假设为国外关注度高的民众在国际观上更为开放,然而此假设在2011年的回归模型中并未得到检验。在2015年的数据中,经常关注其他国家发生大事的民众,会更支持经济开放但反对生活开放。此外,本文纳入了新闻阅读频率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国内的新闻阅读渠道较为单一,更常接触政府的新闻宣传更易于导致民众对国外生活的排斥,不过,却会支持在经济上的开放态度。

3. 传统主义价值观假设部分通过检验。在2个模型中,传统主义倾向高的民众在经济开放度上均表现得更为保守;不过,传统主义价值观和生活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在2011年的模型中未得到验证,但在2015年的模型中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此外,在2015年模型中,传统主义价值观与移民接纳度之间并

无显著的相关性。传统主义价值观对国家观的不同面向有着不同的影响,显示了儒家文化本身的纷繁复杂。

4. 集体主义价值观假设也得到了部分验证。本文的研究表明,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经济开放度、对移民接纳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但与生活开放度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换言之,支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民众更倾向于保守的生活方式。这说明,在我国民众心目中,作为核心价值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具有同构性。

5. 政治权威观假设得到了验证。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西方,具威权人格特征的中国民众,既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也倾向于在对外态度上的强硬和排外。^[22] 本文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支持这一论点,即威权主义取向的中国民众在生活和经济的对外开放上更加保守。在本文讨论的两波数据、5个模型中,除了2015年的模型3外,政治权威观模型均得到验证,它与诸因变量呈现了显著的负相关。

此外,各主要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首先,民众对政府的绩效评价与经济开放、对移民的接纳度展现了显著的正相关。这表明,作为民众对政府能力和信心的体现,政府绩效有助于民众相信政府能够处理好对外经济开放与对境外移民等问题,这种自信有助于民众对经济开放和外来移民持欢迎态度。其次,高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民众支持经济开放并接纳外来移民。这表明,教育作为影响价值观的重要因素,既有助于民众更关注政治并拥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也有助于民众在享受全球化福利的同时在对外开放上持积极态度。再次,生活满意度高的民众对生活和经济均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生活满意度高的民众往往更加温和与包容,对待外来事物的接纳度也更强。最后,年龄因素显著地影响到民众的国际观倾向。已有的研究表明,年老的人更趋向于保守的价值观念,相反,年轻世代则更开放。本文的结论支持此论点,即:在国际观诸面向上,年龄越大的民众越保守,而年龄越小的民众则越开放。

四、结论

本文意欲建构较为系统的“国际观”理论类型,并依据2011年和2015年在国内的两波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民众的国际观进行初步探讨,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一是我国民众的国际观总体上较为保守。学界以往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特殊群体(如留学生、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在特定领域(如经济、贸易)中或保守或开放的态度,有别于此,本文通过两波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并以三项测量指标综合展现了我国民众在国际观上的态度。本文受访者中的多数希望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拒绝接受外来的生活方式;多数人主张我国应该限制进口外来商品,并认为我国应该减少移民或者保持现状。在生活方式的开放、外国产品的开放和对外国移民的接纳等三个向度,持一致性开放态度的受访者仅占极小比例。

二是影响我国民众国际观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国家优越感与国族自豪感模型、国外关注度模型、集体主义和政治权威模型均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对民众的国际观有着程度不一的影响。此外,教育与年龄、政府绩效与生活满意度评价也对民众国际观的不同面向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结论验证或回应了学界的已有讨论。比如,国家优越感和国族认同感的影响,显示了民族主义对国际观的反向影响;威权人格取向的民众更加排斥生活和经济上的开放;国外关注度和教育程度对开放生活方式和境外产品的正向影响,而传统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就截然相反。

实际上,上述得到验证的常识性判断应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比如,为推动民众国际观的包容与开放,就应当注重提高教育程度、扩展民众对境外社会的了解、优化政治社会化机制、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并处理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教育。

最后,应当承认,我们尽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观理论类型和操作化设计,可作为实证研究的设计参考,但本文所使用的两波数据并非依据专门的研究设计而采集,因而,无法对我国民众的国际观之类型与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研究结论仅具有探索性。这种缺憾应当通过专门的研究设计,并依此采集系统而扎实的数据来开展科学研究而弥补。

参考文献:

- [1] 宋全成. 欧洲难民危机: 进程、特征及近期发展前景[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 (2).
- [2] 王义桅. 难民危机挑战欧洲价值观和一体化[J]. 南风窗 2015 (20).
- [3]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 [4] 费正清. 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M]. 杜继东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10.
- [5] 列宁全集(第2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6] 韩冬临. 想象的世界: 中国公众的国际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7] 李慎明. 中国民众的国际观(第1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8] 宁越敏 等. 中国大学生的国际观调查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1 (1).
- [9] 金盛华. 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3).
- [10] 李开盛. 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两种思想传统及其争鸣[J]. 现代国际关系 2006 (12).
- [11] 王鑫, 肖唐镖. 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 (5).
- [12] 卢春龙, 田野. 中国城市居民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 强度与来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 (9).
- [13] Huang H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9, No3 2015 pp613 - 634.
- [14] Jeanne Watson and Ronald Lippitt, "Cross - cultural experience as a source of attitude chang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March 1958 pp. 61 - 66.
- [15] Donglin Han and David Zweig, "Images of the World: Studying Abroad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2, No6 2010 pp. 290 - 306.
- [16] Barbara Geddes and John Zaller, "Source of Popular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3, No2, 1999 pp45 - 60.
- [17] 马得勇.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 (5).
- [18] Johnston, AI, "Chinese middle class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scent liber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9, No9 2004 pp603 - 628.
- [19] [美] 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 马殿军, 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20]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M]. 张秀琴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21] 马得勇. 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J]. 世界民族 2012 (3).
- [22] 马得勇, 王丽娜.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分析[J]. 社会 2015 (5).

(责任编辑: 余小江)